

汉江晨报



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是共和国的“同龄人”，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，更是中国从“站起来”到“富起来”，再到“强起来”的见证者。

今天，我们讲述这些见证者经历的故事，是希望通过他们见证的祖国发展变化，感受曾经的来之不易，也激励我们立足岗位，继续与祖国共成长。

衣服上。

当我们在江北办张沟社区干部的带领下来到安怀忠家，看到他穿着记载他一生荣耀的工作服时，那种沉甸甸的记忆与他那满脸皱纹舒展开后的笑容一起，把大家迎进了门。

安怀忠出生在咸阳市旬邑县的农村，姊妹四个，他排行老三。姊妹多，家里贫困，安怀忠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的性格，毕业后进入铁路系统成为一名铁道工。1972年，为支援襄渝铁路建设来到安康。

“我们一起来安康的有50多人，当时从咸阳坐火车到宝鸡，再从宝鸡转乘到安康。当时的安康火车站只有两层瓦房，车站广场也很小，进站路还是土路。车站广场停放的大多数是货车，偶尔见到一辆小汽车，那也是单位的公务用车……”安怀忠回忆第一次来安康见到的情景如数家珍。

来安康后，安怀忠便在中渡市场附近租了一间房子，房间很小，每月租金10元，“不要小看10元，当年我们的工资才60多块钱呢！”那时的安康，没有高层大厦，放眼望去，都是清一色的小青瓦房，最高的也才两层，安康城里的街道也是土路。安怀忠到安康后，被分配到紫阳工区，“襄渝铁路当时才建到达州，受紫阳泥石流灾害，铁路桥和隧道时有被毁。毁坏后，我们就负责改线重修任务。全线贯通运营，已是1979年了。”

安怀忠说，安康的变化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。安康的铁路建成，打破了安康依赖水路的历史，也打开了安康对外开放的大门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，安康的发展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，市场开始活跃，工商资本也纷纷进入。

可是，正在安康奋力谱写改革篇章之时，1983年的一场洪水，让安康蒙受巨大损失。安怀忠说：当时安康一片汪洋，低洼地带的房子仅露出一个屋顶。洪灾过后，国家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，支援安康恢复重建。也是在那时，安康水电三局对安康火车站进站路进行了硬化。与此同时，安康城区有了高楼大厦，路面也硬化了，从而告别了“雨天一身泥。”



瀘溪是西北最大的人工湖，大坝建成供水，开启安康康康之先河。 吴定国 摄于1998年7月

1989年，辛勤奋战在铁路一线的安怀忠，分得了一套46平方米的福利房。比起现在大多都是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来说，这个房子显得很小，可是，虽然只有46平方米，还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，功能划分整齐，在当年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也是很不错的了。

进入新世纪，安康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、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声中步履铿锵，不仅安康城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安康的广大农村也发生了巨变。安怀忠说，原来回一趟家，坐火车必须绕到阳平关，一趟十几个小时。西康铁路通车了，安康到西安只要4个多小时，我到咸阳老家也5个多小时。不仅如此，乡村都修起了漂亮的小洋楼，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。

近些年，安康发展更快，不仅江南城区大变化，江北、高新区高层林立，一派大都市的景象。见证安康发展的安怀忠也是安康建设的排头兵，他先后获得全国劳模、铁道部劳模等。从单位退休10多年了，他感叹时光蹉跎，不能再为国家建设出力。退休后，他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，热爱秦腔的他，还是社区文艺骨干，组织社区老年人义务演出，实现了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。

忆里，住在安康县城的姐姐家，最初也只是住着两间茅草房，1983年大洪水过后，政府补贴才盖起了4间砖木结构的房子，现在姐姐家盖起了8间7层的楼房。

“由于家庭成分不太好，一直到1986年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从入党的那天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事。”56岁开始，朱纪安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，直到去年才从岗位上退下来。村上家家户户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，最早的羊肠小道到泥土公路，再到现在的水泥路；全村420户人家全都告别了过去的石板房和瓦房，清一色的楼房；一些能人大户在村子里发展起魔芋、黄花等产业，一些外地的企业公司也来到村上发展乡村旅游……朱纪安看着村子一天一个样。“我虽然退休了，但心情很畅快。没事了帮村干部出谋划策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”

从土路到柏油路，70年，安康实现县县通柏油路村村通水泥路。

从土路到柏油路，70年，安康实现县县通柏油路村村通水泥路。

★实习记者 滕静

在即将到来的国庆节，在安康运输公司工作了40多年的陈代恩有不同于常人的喜悦和自豪，因为老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。陈代恩1966年参加工作，2003年5月份退休，也是安康交通事业的见证者和亲历者。说起安康的公路变化，他说，在当年都不敢想，那时候跑车从安康去西安，走西万公路翻秦岭到西安，需要20多个小时，现在在坐火车到北京时间还要长。

陈代恩是五里镇人，在家里排行老大，下面有四个妹妹，他出生后的十天，新中国正式成立。当时家里不富裕，母亲为接济生活，有时走几十里路去县城背回几十斤散装白酒，在家门口售卖。陈代恩曾和母亲去过一次，“几十斤的酒桶压在背上，走上几步累得喘不上气了。”

作为长子的陈代恩必须早早承担起家庭重担，1965年，16岁的陈代恩被招工去了安康运输公司。但是，心里还有当兵梦想的他，1966年报名参了军。去东北大兴安岭当了机械兵，从安康出发去齐齐哈尔，陈代恩老人说，水路陆路都走过，“上世纪六十年代安康汉江上还没有桥，过河要从七里沟坐渡船，然后坐汽车到阳平关。从阳平关坐火车到齐齐哈尔，一路上经过7个省16个市。”陈代恩在路上颠簸了10天11夜。“现在要去可以走高速，还可以坐飞机。都是一两天的时间。”

当时部队为修建黑龙江省的嫩江线做援建工作，解决当时东煤西调。东北地里的土都是黑色的，连队自己种菜不用施肥，地里的土肥得很，种的土豆有安康本地的两三大。去的时候是3月份，晚上刮大风帐篷刮飞了，第二天陈代恩感冒发烧到42度，后来落下了肺上的毛病。1971年陈代恩复员，回到原单位工作，分配去了车队跟车，当时安运司有5个车队。安康通向外面两条公路，一条是安康到西安，一条是安康到湖北竹溪，而且都是土路。

从安康到西安，陈代恩开着一辆河北大轿车，一路上顺着盘山路翻越秦岭，20几个小时的山路，道路坑坑洼洼还很狭窄，遇到对向有车辆会车都很危险，稍有不慎车轮就会滑入路边的崖。“不知道当时人的胆子怎么那么大。”陈代恩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感慨那是在用生命开车。

直到后来，三线建设时安康开始修了几条公路，慢慢各县通了车，但都是毛路。通往岚皋的路很险，路程需十几个小时，早上七点发车，正常情况下午五六点到，但是经常在路上会因为天气不好需要过夜，直到第二天才能到达。三线建设时安运司慢慢购买了国产陕牌小轿车和河北轿车，有两百辆车跑客运。虽然车辆增加了，但是各条线路的道路还是太差，有一次陈代恩到平利过女坝山时，遇到雨天，地上的烂泥有一尺高，车轮一半都陷进去了，底盘都是蹭着地面走。“如果是晴天也好不到那儿去。”陈代恩笑着说，“跑一趟车回来，头上身上都是黄土。”因为交通不便，当时跑各县时看见有的农户种的水果或干果很多都烂在树上。陈代恩说，看着很可惜。

三线结束后，因为客流量少了，安运司削减了一些车辆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，各县外出打工人员增多，公路运输又兴旺起来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单位开始体制改革，实行股份承包制。

陈代恩记得公路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是在自己退休前后几年，到县上的二级路都在一截一截修成柏油路。现在十县区均实现二级以上公路相连，尤其是去岚皋的路改线后时间缩短了也安全了。

“有时听到年轻的客车司机埋怨路上经常堵车不好开。”陈代恩说，现在生活好了路好了，车多都是难免的。

虽然已退休十几年，陈代恩每天坚持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，对现在国际国内事件都了如指掌，而且还有自己的见解。弹指一挥间，70年岁月悄然流逝。陈代恩一路走来到今天，感受到国家的好政策，见证了这么多年来党为人民做的每件实事好事，所以十分珍惜现在的生活，并且经常教育子孙子女在外上学要端正思想，明辨是非。

从吃得饱到吃得好，70年，安康与共和国一起实现了富起来。

★记者 杨廷伟

“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，现如今已经走向了强起来的阶段。”家住汉滨区五里镇牛山村的朱纪安与共和国同龄，从孤苦伶仃自小受歧视的穷孩子到现在住着楼房，他亲身经历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

在缺衣少食的岁月里，朱纪安还是幸运的。13岁的时候，稍有点文化的养父把他送到了安康县（现安康市）第一小学读书。朱纪安记得尽管当时学费不贵，一学期8元钱，但仍然有大量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只能在家帮助大人干农活。“那个时候农村就没有学校，我当时上学时，就经常住一些大点的机关单位跑，捡一些他们用过的废纸，拿回家后自己做成本子写字，捡别人丢弃的钢笔，修一修自己用。”

天刚亮，朱纪安就赶紧起床。吃点早饭，背着三四十斤的粮食从牛山到安康县城上学，等走到七里沟的时候太阳都已经落下了，赶着最后一趟渡船过江去学校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整个安康县城的老城和新城，一共只有4家国民食堂，吃饭必须凭粮票。“教育太落后了，整个村子能上小学的都没几个。”在市一小读了一年的书，第二年秋季入学时，养父因病卧床不起，实在凑不起几元钱的学费，朱纪安不得不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。尽管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，整个夏季一人只能分到二十斤麦子。“当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，就那么点粮食根本就不养活。”

生产队起早贪黑，15岁的娃抢着干大人的活，仅50斤的身体硬是挑起100斤的粮食，用10年生产队的艰辛换来成家立业。结婚时，朱纪安四处借来100斤苞谷艰难地撑起一个家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他给生产队喂猪做饭，开豆腐坊，任何能折腾出钱的事他都干过，但还是无法解决一家人的温饱。为了不让孩子挨饿，就把女儿送往住在安康县城的姐姐家，等收割了麦子家里分了粮才把女儿接回来。有一次，朱纪安去县城准备接女儿回家。到了姐姐家，朱纪安没有立刻动身回家，而是去街上转转，等回到姐姐家的时候发现女儿不见了。朱纪安急得四处寻找，后来就在姐姐家不远的一个街口找到了女儿。“女儿穿着脏兮兮的衣服，哭得眼泪鼻涕抹得满脸都是。”看到女儿的样子，朱纪安心里一阵阵发酸，“这么大个人，连个女儿都养不活。”朱纪安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让女儿吃饱饭，接受教育，并且要带领村民一起奋斗，让大家都能吃饱肚子，让村里的娃都能在教室里学习。

后来朱纪安被推荐当了生产队长，他就带领村民们实行小段农活包工的做法，村民们热情高涨，一年下来，除了给国家缴纳的粮食外，每家每户都分到了足够吃的粮食，工钱也从最初的几分钱涨到几毛钱，再到一块多钱。“现在到安康城三十四分钟就到了，出去打零工，随便都是一两百元，根本就没办法比。从村上走出去的大学生、企业家和领导干部也是越来越多。”在朱纪安的记

从缺少食到小康生活，70年，安康实现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。

★实习记者 唐正飞

1949年12月中旬，恒口白渔村的张家迎来了第5个孩子，父母取名为张先煜。张先煜生在上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，一家7口挤在仅有的3间矮小土房内，别人的房子都是四面墙，而张先煜家的房子只有三面，后背墙是将房后的山丘垂直凿平整的“懒墙”。当张先煜的五弟出生时，张父看着窄小的房子及2亩旱地和1亩水田，又怎么能养活一家8口呢？便做了一个张先煜现在看来都是明智的选择：放弃了汉白路旁交通还算便利的家产，和远在大东山深处郑家做了交换。那年张先煜4岁，全家人告别了土地平整的“西路坝”，“隐居”在拥有12亩土地，4亩水田的石转小坪村。在父亲明智选择之后，张先煜一家在交完公粮后，基本能自给自足。

张先煜上完了高小（小学六年级），适逢当时的安康县医疗队在石转卫生院举办“赤脚医生”培训班，“有文化”的张先煜被选入其中。两年的培训，让张先煜成为了一名走村入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。1968年2月，张先煜应征入伍的请求被批准了。过完春节，张先煜第一次坐车，经汉阴、到石泉，一路颠簸至宁陕，在宁陕夜宿一晚，第三天坐着摇摇晃晃的卡车翻越秦岭，来到西安。

在部队待了5年，退伍后，张先煜先后在原安康县石转、叶坪等地工作，1996年调任汉滨区民政局副局长。当时，救助是民政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，“不能出现冻死、饿死”这是工作底线。1997年，张先煜分管民政救助，每年都要做救助对象的生活安排，按着“统筹兼顾、量力而行”的原则分配返销粮。时刻挂在张先煜心头的是边远山区的救助对象，从小缺吃少穿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他知道，少一口粮，少一件衣服就可能出人命。但毕竟返销粮有限，需要救助的对象比较多，怎么办？张先煜合计先逐户统计、注明家庭情况，根据当年返销粮总量，制定了每月人均20斤毛粮的标准，针对智障、无劳动力的适度提高救助标准。智障人士实行村邻互助就近照料，按计划每天吃多少，每顿怎么吃。穿衣也困扰着群众，记得有一年，和安康结对的常州市为汉滨捐赠了7个火车皮的衣物。除了住房，住房也是张先煜民政救助的范围。后来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，救济物资也变成了每月每人30元的救济款。近年来，随着祖国的发展，温饱问题已渐行渐远，贫困户也实现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，低保户、五保户被分散安置或集中供养，不再为风吹雨打、严寒酷暑担忧。

从汉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岗位退下来的张先煜，在快乐地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时，感叹祖国变化太快——第一次坐车还是应征入伍时，坐的“解放牌”卡车，在汉滨区民政局任职期间就有了“猎豹”越野车；以前坐飞机是平头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，现在飞机票有时比火车票还便宜；以前，从安康到西安需要两天，随着秦岭隧道的打通，安康到西安当天打来回；以前出门前，还要事前准备好盘缠行李，提前好几天排队买火车票，现在走到哪里手机拿出来刷一下微信、支付宝就行了……

从平房到高楼林立，70年，一座现代化都市屹立在汉水之滨。

★记者 孙妙鸿

听说我们要采访，今年70岁、家住安康城区江北兴教社区的安怀忠，早早地就把那身穿了多少年的铁路工作服找了出来，再把全国劳模奖章、铁道部劳模奖章、全国铁路总工会火车头奖章、抗洪抢险先进个人奖章等大大小小9个奖章别在



改革开放初期，安康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出现了进口货运车。 吴定国 摄于1979年



1993年春节正月初四石泉汽车站，陈代恩准备发车回安康。（受访者陈代恩供图）